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208417）

遗落古都心脏的民族文化瑰宝

——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结构形态变迁研究

YI LUO GU DU XIN ZANG DE MIN ZU WEN HUA GUI BAO
Xi'an GU LOU HUI ZU JU JU QU JIE GOU XING TAI BIAN QIAN YAN JIU

黄嘉颖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208417)

遗落古都心脏的民族文化瑰宝

——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结构形态变迁研究

黄嘉颖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落古都心脏的民族文化瑰宝——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结构形态
变迁研究/黄嘉颖著.—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112-18809-3

I . ① 遗… II . ① 黄… III . ① 回族 - 民族聚居区 - 研究 - 西安市
IV . ① K2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3973号

责任编辑: 石枫华 李杰

责任校对: 赵颖 刘梦然

**遗落古都心脏的民族文化瑰宝
——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结构形态变迁研究**

黄嘉颖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³/4 字数: 219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一版 201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ISBN 978-7-112-18809-3

(2806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 录

第 1 章 绪 论	1
1.1 研究源起	2
1.2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	3
1.3 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的研究意义	10
1.4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回族社区研究进展	11
1.5 研究思路和方法	17
第 2 章 历史时期西安回坊的发展变迁	21
2.1 回坊溯源	22
2.2 民族竞生和回坊兴盛	33
2.3 社会激变和回坊衰微	53
2.4 城市复苏和回坊转机	58
第 3 章 当代西安城市转型与鼓楼回族社区结构形态演化	61
3.1 城市转型背景下的社区转型	62
3.2 鼓楼回族社区社会结构调查	66
3.3 鼓楼回族社区结构形态变迁的动因剖析	74
第 4 章 西安鼓楼回族社区结构形态演进的句法释义	85
4.1 空间句法的分析框架	86
4.2 结构形态演进的空间特征	88
4.3 结构形态演进的空间内涵	94
4.4 结构形态演进的网络构成机制	98
4.5 结构形态演进的存在问题	102
第 5 章 城市回族社区结构形态变迁比较	109
5.1 时空背景	110
5.2 当代嬗变	112
5.3 发展思辨	117
第 6 章 面向和合发展的结构形态整合探索	123
6.1 和合发展的多维视角	124

6.2 结构形态整合的思路与方法	128
6.3 结构形态整合的框架与途径	133
6.4 结构形态整合的制度保障	149
结论与展望.....	154
注 释	159
参考文献.....	162
附录 社会访谈典型个案整理.....	171

图目录

图 1-1 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区位图	4
图 1-2 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范围图	5
图 1-3 研究框架	18
图 2-1 唐长安总体布局图	27
图 2-2 唐长安里坊空间布局图	29
图 2-3 北宋京兆府城图	30
图 2-4 唐宋时期西安回坊雏形经济中心结构演变意象图	31
图 2-5 元奉元路城图	35
图 2-6 清代西安府城图	38
图 2-7 化觉巷清真寺总平面	43
图 2-8 高耸挺拔的阿拉伯清真寺唤礼塔	44
图 2-9 化觉巷清真寺省心楼	44
图 2-10 大学习巷清真寺省心楼	44
图 2-11 小皮院清真寺宣礼台	44
图 2-12 化觉巷清真寺礼拜大殿屋顶“勾连搭”建筑结构	45
图 2-13 小皮院清真寺的砖雕图案	45
图 2-14 化觉巷清真寺偏殿的屋脊装饰	45
图 2-15 清代鼓楼回族聚居区清真寺分布图	47
图 2-16 西安北院门 144 号传统民居平面图	49
图 2-17 清西安府城西北城区空间布局图	50
图 2-18 西安鼓楼	52
图 2-19 北院门历史街区与鼓楼	52
图 2-20 穿越鼓楼门洞进入回族社区	52
图 2-21 民国西安鼓楼回族社区空间布局图	55
图 3-1 西安城市中心城区 RBD	64
图 3-2 鼓楼回族社区居民职业构成（%）.....	67
图 3-3 鼓楼回族社区回民不同年龄段职业构成分异比较	68
图 3-4 不同年龄段回汉通婚率发展变化	69
图 3-5 不同年龄段回民清真寺礼拜频率比较	70
图 3-6 不同年龄段回民清真饮食禁忌比较	70
图 3-7 社区回民综合居住满意度分项比较	71
图 3-8 不同年龄段回民居住满意度评价比较	73

图 3-9 社区居民教育程度分析	75
图 3-10 族群互动的五种结果	80
图 4-1 GIS 与空间句法集成示意图	87
图 4-2 1735 年西安城市句法轴线地图	88
图 4-3 1965 年西安城市句法轴线地图	89
图 4-4 2005 年西安城市句法轴线地图	89
图 4-5 1735 年鼓楼回族社区句法轴线地图	90
图 4-6 1965 年鼓楼回族社区句法轴线地图	90
图 4-7 2005 年鼓楼回族社区句法轴线地图	90
图 4-8 鼓楼回族社区清真寺区位分析图	91
图 4-9 不同时期社区空间智能散点图	93
图 4-10 不同时期鼓楼回族社区与西安城市整体空间关系智能散点比较分析图	95
图 4-11 西安鼓楼回族社区局部居住现状	103
图 4-12 拥挤的北广济街交通现状	104
图 4-13 鼓楼回族社区新建筑与历史建筑的空间冲突	107
图 5-1 清代西安鼓楼回坊位置图	111
图 5-2 清代广州府城图	111
图 5-3 北院门街景	115
图 5-4 化觉巷入口牌坊	115
图 5-5 淹没于汉族民居之中的广州东营寺和濠畔寺	116
图 5-6 北京牛街改造规划模型	121
图 6-1 鼓楼回族社区产业整合分区图	135
图 6-2 鼓楼回族社区内的老字号清真餐馆	136
图 6-3 鼓楼回族社区旅游线路整合示意图	137
图 6-4 鼓楼回族社区轴线系统整合示意图	138
图 6-5 鼓楼回族社区中心结构分析图	141
图 6-6 北院门牌坊文化休闲广场	144
图 6-7 鼓楼回族社区历史文化风貌网络体系	147

表格目录

表 1-1	2001~2012 年回族社区研究相关文献分析	16
表 2-1	“七寺十三坊” 寺坊单元组团结构一览表	46
表 2-2	明清西安城区主要商贸街区一览表	48
表 2-3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西安回坊 “寺坊” 单元结构规模一览表	56
表 2-4	1940 年前后西安回坊及其周边区域主要工厂企业一览表	56
表 2-5	1942 年 1 月西安回坊区域钱庄分布一览表	57
表 3-1	鼓楼回族社区回民居住满意度评价	72
表 3-2	西安市历次城市总体规划与鼓楼回族社区发展之评析	78
表 3-3	族群成员身份认同的变量体系	81
表 4-1	不同时期西安市全局集成能力前五位轴线地位变化	89
表 4-2	鼓楼回族社区轴线三步集成度统计分析	91
表 4-3	不同时期鼓楼回族社区局部集成能力前五位轴线地位变化	92
表 4-4	西安城市句法变量变化分析	100
表 5-1	1951 年广州市回民居住分布概况	112
表 5-2	1961 年广州市回族人口分布统计	114
表 5-3	西安鼓楼回族社区社会结构分析	116
表 6-1	中国台北市社区规划师制度概要	151

第1章

绪论

“我们的地球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宗教和肤色的人们的栖息之地。从远古时代起，当不同部落或民族相遇之后，频繁战争和冲突就接踵而至，大多大于和平方式下的磨合、适应以及对差异的包容。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和种族如何和睦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条街道，这是一个既古老又非常现代的问题。”^[1]

——Feliks Gross

1.1 研究源起

城市是人类社会变迁的前沿阵地，在包罗万象的空间系统当中承载着多元民族共生关系的演绎。作为在中国城市分布最广、形态保持最完整的少数民族社区，回族社区糅合了宗教和民族的复杂关系，并从西域蕃客落户东土逐步演化形成独立民族伊始，就在各城市当中滋生长。从城市的发展我们可以认识到时代的需求与潮流的趋向，而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则从另一角度折射出城市发展的历程与桎梏，成为人类社会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重要见证，也是城市和谐问题的一个深刻的缩影。

1.1.1 城市拆迁引发的城市化问题再思考

城市更新改造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尤其是加速发展阶段的必然经过。因此，由城市更新改造所带来的城市拆迁在城市化历程中司空见惯。然而，正是这一司空见惯的城市现象，却蕴涵着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多种因素的信息反馈，集中体现了各方之间的矛盾，成为暴露城市问题的现实镜像。

纵观中国各大城市，伴随城市的发展，城市回族聚居区已逐步演化形成与城市整体空间血肉相连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是城市的历史街区，或是城市的商贸步行街，又或是城市与国际伊斯兰宗教信仰国家友好交往的桥梁。城市传统回族聚居区不仅是人类共同的城市记忆，而且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城市功能。当前，面向城市建设的高速运转，城市传统回族聚居区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以更新、保护、旅游开发等各种方式试图探索新的社区组织形式，寻求和谐发展的出路。如何解决城市回族聚居区于保护与更新、文化传承与活力复兴过程中面临的重重困境；如何引导城市回族聚居区在浩若烟海的城市化浪潮中创造性地保持民族特色，继续为弘扬历史文化与展现城市个性绽放异彩；如何保证回族群众在城市生活的传统延续与质量提升，这都是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城市回族聚居区和谐发展的时代发问。

1.1.2 社会转型下的城市回族社区发展争议

构建和谐社会是21世纪中国发展的核心主题，是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强调民族、宗教、党派、阶层等重要社会资源的兼容共生。^[1, 2]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正处于城市化高峰期的多民族文化大国，民族问题不仅是中国城市发展长久以来的关注焦点，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

费孝通先生在展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曾提出：“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越多；相反，一个社会越是贫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如果这个规律同样可以用到民族领域里的话，经济越发展，即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各自的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大。”^[3]显然，作为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和谐社会更加强调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城市和谐社会的构筑应当赋予回族传统民族文化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更多的发展可能，而不是对非主流族群文化的淹没与扼杀。正因如此，从建构和谐社会出发，城市回族社区研究不仅要高度重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和社会公平，还必须在回族传统民族文化特色传承与升华的道路上慎思笃行。

1.2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

1.2.1 研究对象的界定

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是历史形成的城市回族穆斯林集聚地，是一个遗落于古都心脏的回族社区。追溯其缘起与古丝绸之路有着深厚的渊源，是形成历史最久远、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城市回族聚居区之一。在鼓楼回族聚居区的发展历程中虽曾几经起伏但从未产生过历史断流，至今仍以回族穆斯林高度集聚的形态坐落于西安古城中心，是西安明城区内现存最大的传统住区。其不仅记载着回族先民的生活痕迹，而且回族发展史上发生的两次重大的文化模式转型都在其空间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注1}。因此，鼓楼回族聚居区的历史变迁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回族社区发展过程的集中映像，在中国城市回族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对研究城市回族社区的历史形成与过程特征有着非常突出的代表性。

从孕育鼓楼回族聚居区的城市区域来看，西安不仅是中国十三朝古都，而且是近代西北重镇，现代西部中心城市，历来是中国城镇体系建设的前沿重地。正因如此，位于在西安皇城之地，与钟楼、鼓楼为邻，历史时期清真寺与巡抚

衙门一墙之分、一路相隔的鼓楼回族聚居区从诞生伊始就经历着中国城市化的洗礼，并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地自我调适，以不同的形式适应城市社会，融入城市文明。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由于区位敏感、历史敏感、民族敏感，城市化、全球化引发的城市问题在鼓楼回族聚居区显现得更加尖锐突出，其形态变迁充分暴露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回族社区发展演进的典型特征与现实困境。前文述及的洒金桥街区拆迁事件仅是西安城市回族社区发展问题的管窥一斑，是隐藏于城市繁荣之下少数民族城市化问题的冰山一角，其中隐含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内涵与规划深意亟待深入探寻求索。

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历史文化积淀之丰富、城市问题之复杂，在本人参与中国和挪威政府合作的《西安回民区保护项目》(1997~2002年)第一次深入该地区进行社会调研时已深有体会。鼓楼回族聚居区强烈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魅力，独特的居民生活交往方式和宗教信仰，以及与西安城市化步调格格不入的居住环境、落后的生活景象，常常浮现于脑海并在心中产生种种疑问，进而开始不断思考城市回族社区发展问题。面对中国少数民族城市化的严峻形势，作为城市规划工作者的强烈责任与使命敦促笔者密切关注城市回族群体的生存状态，投身于城市回族社区研究当中，并选择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这一极具典型性代表性的城市回族社区作为课题研究的具体对象，希冀能为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尽绵薄之力。

在空间上，本研究对象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的界定，主要指位于西安明城区中心的西北部（图1-1），紧邻钟楼、鼓楼广场，东起北大街，西到早慈巷，南临西大街，北至红埠街的城市传统住区与传统商业区，地域面积约 1.3km^2 ，居民总人口约6万余人，其中回族居民约3.5万人，就业方式以饮食业、零售业为主（图1-2）。该地区包括：北院门、化觉巷、麦贐街、大皮院、小皮院、西羊市、北广济街、庙后街、大学习院、小学习巷、大麦市街、洒金桥、早慈巷、香米园、红埠街、劳武巷、光明巷、西仓、东书院巷、新寺巷、东寺巷等街区，并分布着十个清真寺，其中百年以上的古清真寺有七座，在18世纪末，已形成了史上著名的“七寺十三坊”的格局。西安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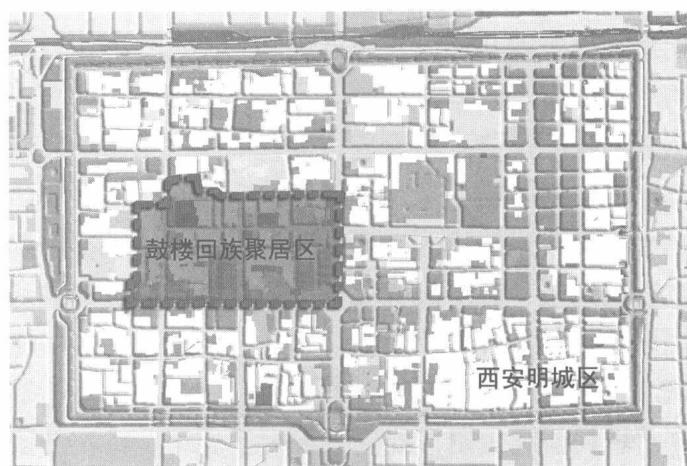


图1-1 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区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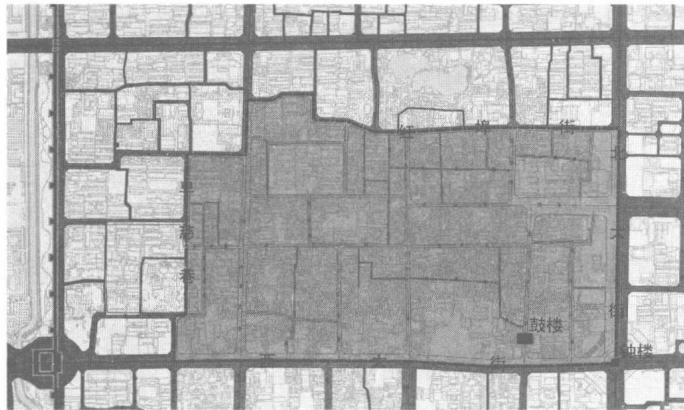


图 1-2 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范围图

楼回族聚居区现属西安市莲湖区管辖，鼓楼门洞是联系城市中心与该聚居区的主要出入口，因此成为该地区的重要地标，也因此称其为鼓楼回族聚居区。也有研究学者称之为鼓楼历史街区，其实质是指其中东起北院门，西至北广济街，南到化觉巷清真寺，

北至大皮院，面积 12.6hm^2 的北院门历史街区。该地段为中挪合作《西安回民区保护项目》的起步范围，也是鼓楼回族聚居区当中历史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核心地段。在时间维度上，对研究对象的考察从唐代回族先民落户长安奠定回族聚居的社会基础起一直延伸至今，研究鼓楼回族聚居区的历史轨迹主要是探究城市回族聚居区形态变迁的动力机制、特征规律以及历史文化价值，而对当代发展状况及演进趋势的探讨主要在于寻求解决回族城市化问题的有效途径，并探索城市传统回族社区和谐发展的合理形态。

1.2.2 相关概念的释义

1.2.2.1 回族和边缘性回族

回族是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之一，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散居全国、分布最广、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唐宋时期的“蕃客”和元代时期的“回回人”被民族史学界认为是回族的母体。^[2]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语系民族到达中国之后跟汉族、蒙古族及维吾尔族相融合，将伊斯兰文化与儒道文化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化兼容并蓄，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复合型文化，并在中华大地上发展形成独立的民族共同体。对于回族形成的时期史学界内一直存在分歧，一般认同距今大约 600 年前的元末明初是回族形成的时期。西北是我国回族人口集中分布的主要地区。据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回族总人口为 986 万余人，其中西北五省区回族人口接近 480 万人，约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 48%。^[4]从最初不同国界、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基于伊斯兰宗教认同的人群指代，到后来成为民族称谓，“回族”一词所蕴含的不仅是区别于中国其他民族的外部符号，同时包含了对于伊斯兰教的情感，对于共同生活习俗的遵从，对于特殊的共同命运的认同。^[5]回族从先民时期伊始就深刻伊斯兰宗

教烙印，伊斯兰宗教文化对回族民族发展影响深远，是回族民族文化的核心灵魂。因此，伊斯兰宗教文化对于研究城市回族社区演进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清真寺则是其中关键的形态与精神空间标志。

伴随回族研究的推进，学界出现了对边缘性回族这一城市化、全球化浪潮下产生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探讨。中国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张中复教授对“边缘性回族”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讲，边缘性回族仅仅具有“回族”的称谓，而失去了回族穆斯林的内涵。伊斯兰教宗教信仰形式的变迁以及和其他民族宗教关系的互动交融被张中复教授视为这种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他发现回汉通婚家庭出生的后代在生活习俗上容易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般而言，他们对回族传统文化不甚了解，有的仅仅保持回族的饮食习惯，长此以往，这部分回族后代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会逐渐淡化，成为边缘性回族。^[6]事实上，边缘性回族不仅产生于回汉通婚家庭，一些纯粹的回族家庭的后代，由于教育环境、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当中外族文化无处不在的渗透与冲击也随之形成边缘性回族。尤其在城市这个多元文化高速碰撞交融的社会熔炉中，边缘性回族的困惑更是普遍存在，这从身为回民的回族研究学者良警宇和马强等作为城市回族边缘人的感慨当中可见一斑。城市边缘性回族的出现与滥觞是城市回族群体缺乏伊斯兰宗教信仰精神归属的现实反映，也是城市回族社区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1.2.2.2 回族社区和哲玛尔提

社区是城市文明的摇篮，也是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依托。作为专门的学术用语，社区（Community）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ounies）于1881年提出来，并将该词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滕尼斯对社区概念进行诠释，认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趋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互助、疾病相扶、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7]社区概念的提出，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其进行讨论并广泛运用于社会研究当中。从国外研究学者对社区内涵的理解中，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地域、共同联系和社会互动”^[8]这些社区构成要素的普遍认同，认为社区是兼有社会和地理的空间概念。在社会学领域，由于社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戴维·波普诺对社区与社会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他认为“集中在某一居住地和工作场所并以社会互动的日常形式为特征的人的集合叫社区。一个包含了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所有社会设置的综合性、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集合被称为社会。”^[9]

20世纪30年代“社区”一词被引入中国，开始出现对社区概念的一些探讨与运用。直至20世纪80年代，社区概念受到广泛关注，并在国内掀起社区研究热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费孝通、郑杭生、吴文藻等人对社区概念的

理解^[10-12]。费孝通将社区定义为“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主要包括以下构成要素：以一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为基础组成的人群；有一定的区域界限；形成了具有一定特点的行为规范和生活；居民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具有对社区的乡土概念。对于社区的构成，吴文藻从“社区是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的定义出发，提出社区至少包括三个要素：人民、人民所居处的地域和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郑杭生则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显然，国内学者对社区的定义都强调一定的人群、一定的地域和共同的社会联系，认同社区是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有机体。^[13]

回族社区，也有学者称之为回坊，指“由相同教派的多个回族家庭以清真寺为核心组成的居住区，是回族集聚地区集居住、宗教活动、商业贸易、家庭手工业、文化交流等多种活动于一体的空间，是回族在共同心理素质作用下，以清真寺为社区标志形成的微观地域综合体。”^[14]由此可见，回族社区是由社区概念衍生的少数民族社区当中以回族为人群构成主体的地域共同体。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即城市少数民族聚落，“一般是指存在于中国城市中的少数民族‘聚居村落或街道’，亦即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域或居住点。”^[15]在众多少数民族社区当中，回族社区是在城市分布最广、聚居形态最突出的族群社会共同体，以独特的宗教制度、共同的民族传统规范和族群社会互动，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文化空间识别性。

现代城市规划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转向了“从空间切入社区，目的又回归空间”的社区规划，更关注人的社会性群体生活。^[16]根据社区理论，社区是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社会单元，通过社区样本可以更真实、深入地观察城市回族的实际生活，发现现实问题。同时，社区概念提供了的三个分析尺度：物质尺度，即社区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地理区域；社会尺度，即在该区域内生活的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沟通和互动；心理尺度，即这些居民有共存感、从属感和认同感。^[17]这三个分析尺度正是城市回族社区形态不同层面的表达。因此，本课题选择以回族社区作为窥视当代回族群体和整体城市社会关系的窗口，进而洞悉其社会结构变迁规律以及城市回族居住形态的空间特征与演进趋向。

哲玛尔提是阿拉伯语“Jama'at”的音译，意为“聚集、集体、团结、共同体”等，意译为“寺坊”或“教坊”，是回族穆斯林对自己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聚居区的称谓。学术界内部分学者采用哲玛尔提这一概念对城市回族社区进行研究，并对哲玛尔提的内涵和外延认识提出不同的见解。杨文炯^[18]通过深入调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社区，分析了哲玛尔提的地缘变迁和文化影响，认为哲玛尔

提在城市社会中是一种独特的族群社区，是回族穆斯林族群存在的方式，并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标识它的社缘边界。周传斌、马雪峰^[19]探讨了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提出在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中，一般比较强调社区的地理边界，而对回族“寺坊”（即哲玛尔提）来说，文化边界更为重要和基本。作为回族社会基层的宗教社区，哲玛尔提更多地依靠共同宗教文化的维系。马强^[20]则将哲玛尔提理解为狭义的哲玛尔提和广义的哲玛尔提之分。他认为狭义的哲玛尔提是指对不稳定的、没有时间确定性、临时组成的穆斯林人群的称谓；而广义的哲玛尔提就其词本身可以表示任何一群人，但在宗教术语中，这一词其实无形中加了限定，即专指穆斯林组建起来的群体，主要是指以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的教坊。显然，哲玛尔提与社区两个概念都具有“地域共同体”的意义，在研究和介绍伊斯兰教的英语资料中，也经常会把哲玛尔提直接对译为 Community。^[21]但就其内涵而言，社区强调地域内的人类群体生活认同和共同的文化维系，并不特指某一族群或某一宗教信仰群体；哲玛尔提则是一种特指的宗教社区，其本身更强调族群特征与宗教特性。本文选择以回族社区而非哲玛尔提的概念进行研究主要也是出于社区与哲玛尔提内涵差异的考虑。回族社区从社区的角度提出对城市回族群体的观察，是一个以回族为主体或许是单一回族也或许是回族与其他民族混居的地域共同体，更为符合城市回族群体居住形态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发展。

1.2.2.3 结构、形态和结构形态

结构存在于任何事物和过程之中，是某一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让·皮亚杰（J.Piaget）等学者^[22]对结构的认识与阐释较具代表性，并提出了结构主义，认为人们要从复杂的现象中获得科学而有序的知识和结论，必须掌握事物的结构，通过分析结构去把握事物的规律和本质。结构主义开拓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思路，并被引入到城市规划领域当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等成为城市研究的关注热点。齐康先生认为“引起城市形态变化的不同范畴、不同层面上的各种作用力是建立在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基础上的，任何一位规划师都摆脱不了它的作用，只能因势利导。”^[23]这里述及的各种作用力正是纽曼·卡斯提尔（Manuel Castells）在分析城市问题时提出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而社会结构主要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组成^[22]。显然，纽曼·卡斯提尔理解的社会结构概念是广义的社会结构，是综合城市政治政策、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城市深层结构。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结构主义理论角度还是从城市研究出发，要从本质上认识城市回族社区，必须深入研究回族群体在城市社会中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必须透析城市回族社区的深层社会结构。根据彼特·布劳（Peter.

M. Blau)^[24] 的理论,社会结构可以用参数来描述,一是类别参数,或称名义性的,如性别、宗教、种族、氏族、职业、工作地点、住地、婚姻、政治联盟、语言符号、国籍等;二是等级参数,如教育、收入、地位、财富、声望、权力、社会背景、年龄、行政权威和智力等。针对这两类参数,本研究选择通过纵向与横向双重向度来考察城市回族社区的社会结构,从纵向的时间向度把握社会结构的动态演化与秩序形成,从横向的空间向度分析社会结构的整合与分化程度,力求对城市回族社区深层社会结构全面认识。关于结构概念的界定,本研究所涉及的结构研究指的是广义的社会结构范畴。

“形态”(Morphologie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Morphe(形)和 Loquos(逻辑),意指形式的构成逻辑^[25]。形态学研究最早见于生物学领域,用以研究生物体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形式状态。借鉴形态学的理论和概念研究城市源于19世纪历史地理学中的城市地形形态学,并且很快扩展到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领域,逐步形成了研究城市发展模式与过程、预测和控制城市未来发展的城市形态学。城市形态的定义大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城市形态是指城市实体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空间物质形态,是构成城市所表现的发展变化着的空间形态特征,主要包括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各个要素如物质设施、社会群体、经济活动和公共机构等的空间分布模式)和城市外部形状(城市外部的空间轮廓)这两个层面的内容。^[26-28]广义的城市形态由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部分组成。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城市各有形要素的空间布置方式、城市社会精神面貌和城市文化特色、社会分层现象和社区地理分布特征以及居民对城市环境外界部分现实的个人心理反应和对城市的认知^[29]。从狭义的和广义的城市形态定义可以看出,城市形态是研究各种城市活动作用下的城市物质环境的演变,包括城市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及其相互关系。^[30]其中,内部结构主要与前述广义的社会结构相对应,外部形态则强调城市空间形态,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渗透关系。

安东尼·吉登斯在其代表作《社会的构成》当中指出:“日常用语里的‘社会’一词有两种主要意思(其他还有一些,比如‘上流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其一是‘社会交往’,或社会互动里包含的广义含义;其二是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某一‘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它有特定界限,以使自己与周围其他社会区分开来。”^[31]显然,本研究的回族社区属于后者,以独特的宗教、文化特性区别于城市其他社区,并在空间上形成明显的地理界限和形态标志。城市回族社区空间形态上的隔离根源在于回族族群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分异。回族族群社会与城市社会的交融与同化深刻地影响着回族社区空间形态的特征形成,形态的隔离又为特定的社会形式的衍生提供了空间壁垒。空间形态的演进是城市回族社区变迁的外延表